

莫言5年无新作,诺奖成包袱了吗

本报评论员
陈江



是莫言自己给自己太多压力,想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莫大师被更炫目的光环羁绊。

牛仔很忙,莫言也很忙,即便得诺奖五年之后依然如此。昨天《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莫大师此次受邀在香港举办讲座,言及自己的近况和写作,坦言五年来基本没写东西,主要是在世界各地演讲。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活动太多,“十个邀请中只选一个接受”,也让他忙不过来;另一方面,得奖之后下笔更谨慎,有几部作品,如果按过去的要求可以推出去发表,但现在总感觉不好,还在打磨与修改,希望能修改得再好一点。

说真的,莫大师这番话让人顿生好感。开天辟地的诺奖得主,敢于实话实说,夸网络文学和段子手,否认了网上疯传的《你若懂我该有多好》是自己的作品,还说,“要真是我写的该多好!”面子给得,简直不要不要的!你见过如此低调、实在的诺奖得主吗?可是这么懂事的莫大师,如今下笔也谨慎了。

可为啥一定要有新作?仔细一想,这个命题有点奇怪。莫言人如其名,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经年累月被生存磨去了棱角,但他用讲故事的方式,通过现实与虚幻、魔幻结合的手法,从早期《红高粱》的热情张扬,到后来

《蛙》和《生死疲劳》的隐忍,用各种隐喻表达出生活的真实状况。得奖是一次表彰,实至名归,他开创了历史,写就了一代传奇。再说,诺奖本来就是表彰他已有的文学成就,而不是他未来的创作潜力,更不是创作的数量和速度。即使他此后一篇不写,就此收手,又有何妨?本来的文字获得了荣誉既是对莫言的肯定,而因此产生压力要把文字再打磨修改,那获得的荣誉不成荣誉,反成伤害了。

事实上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从来就不是随随便便的,倘又获奖,除了作品本身,更多的是机缘巧合罢了。只不过,国内在经历了对诺贝尔文学奖长久的渴望后,需要“消费”莫言,需要有一个值得追捧的文学偶像。置身于这样一种喧嚣的荒诞中,莫大师恐怕难以抽身,只能苦笑打趣了。就好比曾经的刘翔,110米栏成为了“世界第一人”之后,大家不愿意接受他拿不到第一,不愿意接受他退赛一样。

《史记》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最难过的关口恐怕就是名利关了。对于人来说,最痛苦的不是从未得

到,而是失去。特别是对本身显得更安静的文化圈子来说,荣誉是读者对自己的肯定,而这份荣誉反过来也会为自己吸引来更多的读者,所以荣誉加身下,会对自己提高要求,以期望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读者。然而很多时候读者并不会觉得作家获奖与否与自己是否喜欢这个作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村上春树没有得诺奖,依然能够收获一批批迷弟迷妹。哪怕走出圈外,我们喜欢一个球星,并不会因为这个球星拿不了MVP而不喜欢他。大家对喜欢的人,永远没有那么苛责。所以,或许并不是读者给莫言了压力,而是莫言自己给自己太多压力,想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莫大师被更炫目的光环羁绊,大师再“大”,终究是肉体凡胎。

不想成也诺奖,败也诺奖,莫大师大可以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在诺贝尔奖这件事上患上失忆症,忘记它,回到从前,想写就写,写不出拉倒。如果诺贝尔奖是个顶峰,到了顶峰,迟早是要下山的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不了,那么就只能退了。要么干脆学学金大侠,早早封笔,莫再多言了。

虐童事件频发,监管应有震慑力

本报评论员
陈进红



民营特殊儿童教育机构缺乏监管,是悲剧发生的根源。

猛摇身体、打头、扇耳光,把孩子强按在厕所里,威胁拉到裤子里就让他吃掉……院长言传身教如何打孩子,多名老师抽孩子耳光或拿木棍打人,称“为让他发音哭出来。”这令人发指的一幕幕发生在南昌希望言语康复语训中心。

一直到被曝光,该院院长还称“自己是做好事”,院方也是受害者。“暗访记者待了十多天,爱心温暖的画面不拍,专门挑那些刺眼的博眼球。”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童年遭受到虐待的孩子,他的心理会有什么样的阴影,更何况受虐者还是聋哑儿童。而对于这些孩子会留下怎样的心灵伤害阴影,也许这些老师根本不在乎。甚至这里的老师并不认为这是虐待,而是为了孩子们好,“因为他不会发音,是让他哭出来,声音就会大一点。”老师没有资格证,没有经过专业特教训练,这样一个如地狱般的教育机构竟然存在了20多年。这样缺乏师德的人坐到院长职位,这也暴露出相关部门对聋哑儿童教育方面的疏忽。

就在前一阵,沈阳一幼儿园老师虐打聋哑孩子也被曝光。为什么这样的事屡屡发生?数据显示,6岁以下听障儿童在中国有13.7万,并且每年新增2.3万。而特殊儿童教育机构严重供给不足。有专家不完全统计,不仅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均衡,全国仍有589个30万人口以下的县没有特教学校,而且不同教育阶段、特殊教育所关注残疾儿童的障碍类别也不均衡。南昌市残联工作人员也表示,现在还不能直接关闭培训机构,由于具有相关资质的培训学校规模有限,如果一旦关闭,其中的50多名聋哑孩子就有可能面临无学可上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院长坚信自己是在做好事的原因。

而民营特殊儿童教育机构缺乏监管,是悲剧发生的根源。我国民营特殊儿童教育机构在申请开办时,此前需要到民政局登记,并挂靠在有关部门下面,受其监管;但随着民营特殊儿童教育机构的迅速发展,政府放宽了对

其管制,使部分民营机构不再需要挂靠到有关部门下面,并不再受其监管。这样,监管的责任就转移到了残疾人联合会等行业协会上。并且尽管我国已经出台《未成年人保护法》,但其中规定多为原则性,可操作性不强。当家长发现一些老师虐待孩子的时候,就算进行举报和告发,得到相关部门处罚的违规人员,其实并没有付出很多代价。毫无震慑力的违法成本,很难对违规的幼教人员起到遏制作用。正因为如此,虐待儿童事件才频发。解决特殊儿童教育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儿童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关问责机制的完善。

有网友说,这是现实版的《熔炉》。韩国国会竟然为此特别通过了熔炉法,加强了对残障人士和未成年人性侵犯案件的惩罚力度。最后用《熔炉》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不要用满腔的愤怒和眼泪结束,要凝视真实直到最后,重要的是永远记住真实,这才是拯救希望的稳固的根基。”

非浙A车限行拟升级,当多听不同意见

本报评论员
高路



治堵的本还在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在于过硬的城市基础设施,在于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

这几天,有关杭州非浙A牌照限行措施可能升级的传言让不少人心惊肉跳,外地牌照还能不能开了,限行区域是不是得扩大了,限行时间是不是得延长了?有人质疑这是治标不治本,有人拍手叫好,另外一些人则大叫不公,怎么能搞地域歧视呢?

消息来自于正在征求市民意见的《杭州市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中的一段话,并不涉及具体方案,八字还没一撇呢,坊间的议论都只能算是猜测。但公众的参与讨论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多听听反对者的意见,也能帮城市管理者更好地规划决策。

限制措施本身是把双刃剑。能不限当然最好,但城市有这么大的容量吗?能否承担得了这么大的负担?这是基于现实的考量,有时候也是不得不做的事。如果不限行不限牌,杭州的马路得堵成什么样子?但对于正

当性的质疑,杭州应该拿数据说话,比如外地牌照在杭州市区的道路占用率是多少,对拥堵的影响有多大等等详尽的数据。

但光靠“限”的确不能解决问题。这几年杭州在治堵上有长足的进步,市民的感受就是马路似乎不像以往那么堵了。高德地图已经数次将杭州排除在全国十大堵城之外,市民的感受和数据都支持杭州治堵的成效。这与实行限行限牌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杭州这几年基础设施建设的突飞猛进。

从整体上说,城市框架在拉开,容量在扩大;城市综合体在主城区遍地开花,几条非常重要的高架、隧道、马路相继开通;城市出入口经过整治以后更通畅了,人流物流都有了更合理、更科学的运转;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让城市格局扁平化、去中心化了,这些都有利于治堵。从局部上说,一些特定功能被转移到

老城区,比如省儿保浙医二院相续在滨江区开通院区,将原来老城区的很大一部分车流都疏散了,老院区周边得以喘了口气。

这些都表明,治堵的本还在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在于过硬的城市基础设施,在于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在这一方面不是没有遗憾的,比如留石高架改造以后,按理说不应该堵了,可是在上塘高架和通益路这一段依然堵得很,原因在于出口不够通畅,影响了车流的效率。这种堵就很难说是车子多的问题,而是规划设计上的不合理。

作为临时性措施,限行限牌都有合理之处,这不影响杭州对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的追求。杭州非常明白根本的解决办法在哪里,未来随着地铁的开通,交通设施的完善,地铁四通八达,没有堵塞之忧,大家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限行与否还重要吗?